

Revolt in Absurdity: A Study of Camu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PAN Yan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China

Received: October 23, 2023

Accepted: November 1,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PAN Yan. (2023). Revolt in Absurdity: A Study of Camu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018–02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3](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03>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the famous French writer Albert Camu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two philosophical essays *The Myth of Sisyphus* and *The Rebel*. Camus focuses on the dilemmas and realities faced by human beings,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world and how they should live and act in the moral sphere. While clearly advocating a “poetics of revolt,” he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after the absurd,” pointing out a path of humanism beyond religion and violent revolution for the world. This paper explores Camu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from three aspects of his attitudes towards the world, religion, and fate and analyzes the way of revolt he advocates for living in a paradoxical and absurd world.

Keywords: Camus; philosophy; absurdity; revolt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PAN Yan, Ph. D. in literature,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荒謬中的反抗：加繆哲學思想研究

潘 艷

廣州商學院

摘 要：法國著名作家阿爾貝·加繆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部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的神話》與《反抗中的人》中。加繆關注人所面臨的困境和現實問題，思考人在這個世界的處境以及人應該如何生活和行動等道德範疇的問題。他在鮮明地高揚一種「反抗詩學」的同時，回應「荒誕之後」的價值取向問題，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在宗教與暴力革命之外的人道主義之路。本文從加繆對世界、宗教與命運的態度三個方面切入，對其哲學思想進行探討，分析他所主張的在矛盾荒謬的世界上生存的反抗方式。

關鍵詞：加繆；哲學；荒謬；反抗

法國著名作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他的兩部思想性著作《西緒福斯的神話》與《反抗中的人》是文學味濃厚的哲學隨筆，他的哲學更多源自生活，思考人在這個世界的處境以及人應該如何生活和行動等道德範疇的問題。加繆關注人所面臨的困境和現實問題，其思想的核心主題是思考在一個嚴峻的時代裡應當如何「做人」。他將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注入到文學寫作之中，在鮮明地高揚一種「反抗詩學」的同時，回應「荒誕之後」的價值取向問題。他試圖向現代人提供一種在矛盾與荒謬的世界上生存的道德觀，提倡積極參與和介入，拒絕虛無主義，堅持人道主義的立場。本文從加繆對世界、宗教與命運的態度三個方面切入，對其哲學思想進行探討，分析他所主張的在矛盾荒謬的世界上生存的反抗方式。

一、荒謬的世界與歷史

「荒謬」一詞源於拉丁文 *absurdus*，最初的含義是「悖理」，即違背理性或與理性相反，引申為形容一切矛盾或謬誤的事件與論證，並無特定的哲學意涵。^①荒謬的觀念自古有之，是人面對世界產生的一種自我心理體驗，是人的主觀意識對外部世界的一種領悟，是作為一種個體的感受存在的。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尤其是以荒謬作為出發點的存在主義思潮風靡西方之時，荒謬的觀念才成了一種自覺的意識上升到哲學領域，成為一個具有確切哲學內涵的新概念，並由此發展為一種美學觀念在眾多文化領域散播開來。^②

「荒謬」是加繆對這個世界最直觀的感受和體驗，是現代人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的困境中產生的巨大的悲劇感，他以此作為起點開啟了思索，並從哲學的高度展開理論性的探討，將其哲理化並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加繆的《西緒福斯神話》是二十世紀西方唯一一部集中探討荒謬問題的哲學論著。在該書的開頭，加繆開宗明義地指出哲學的基本問題就是「判斷人生是否值得一過」^③。在加繆看來，人總是希望對人生的意義有一個清楚明晰的答案，但在生活中人卻屢屢遭遇一種「不可捉摸的荒謬感」^④，一種人與世界之間頑固而

恒久的陌生與疏離。加繆認為，人有對熟悉和明晰的要求，希望能夠通過理性來認知和把握世界，但世界是非理性的，沒有規律和法則可循。人對理性的渴求與世界的非理性是對立的，正是這種「對熟悉感的需求，對明晰感的要求」^⑤與世界呈現的非理性的碰撞導致了荒謬感的產生。加繆認為荒謬的產生取決於兩個要素，既取決於人，也取決於世界，荒謬是人與世界之間唯一的聯繫。荒謬因而就存在於追求理性的人與非理性的世界的張力之間。

正因為世界是荒謬的，所以在加繆看來，歷史的發展也是一個非理性的進程。歷史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並不存在必然的演進過程以及黑格爾式的線性進步的歷史和美好的終極理想。加繆指出他那這一代人面對的是一個「既不確定，又無指導」^⑥的荒謬的世界，經歷的是一個充滿暴力、破壞和死亡的時代，所「繼承的歷史是腐化的，混雜著失敗的革命、瘋狂的技術、死去的神祇和疲弱的意識形態」^⑦。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的浩劫，戰爭對人造成的精神折磨和心靈扭曲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了，在納粹政權垮臺後，極權統治仍然以其他形式存在。

在《反抗中的人》一書中，加繆對理性主義進行了批判並對線性進步的歷史觀念提出質疑。加繆認為歷史哲學誕生於基督教的觀念，這種線性的歷史發展的設想源于基督教對人生與世界的看法。基督教徒把人的生命及事件的發展視為從起點向終點演進的歷史，在此過程中人獲得拯救或受到懲罰。加繆認為進步的概念源自啟蒙運動時代及資產階級革命，他對線性進步歷史觀念抱持批判的立場：進步，科學的未來，技術與生產的文化，這些是資產階級的神話，構成了十九世紀的教條。與之相反，加繆推崇古希臘時代關於變化的概念和把世界看作是迴圈發展的觀點。

歷史主義是一種關於歷史和社會的哲學，認為歷史的發展具有必然性，人能夠通過認識絕對有效的「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畫社會的發展，根據客觀的歷史規律解釋過去從而預見未來。在波普爾(Karl Popper)筆下，歷史主義即歷史決定論，是「一種有關歷史趨勢的定命論」^⑧。他曾用形象化的語言概括歷史主義的本質：「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是一條有源頭的河流，他們可以弄清楚它會流到哪裡去，也認為他們有足夠的智慧可以預測未來，這在道德上是一種不正確的態度。」^⑨歷史主義宣導一種追求報酬的倫理，即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歷史主義中獲得合法性的正是根源于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進步暴力論」。

對加繆而言，正因為歷史是荒謬和非理性的，所以歷史主義，或者說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目的論是站不住腳的，並不存在歷史終結之處的世間天堂。加繆並不否認歷史的力量，但反對神化歷史，更反對以歷史的名義為惡，使其為政治犬儒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服務。加繆反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達到政治意圖，反對假歷史之名行暴力之實，反對挾自由、正義的名義在理性秩序的掩蓋下將殺戮手段合法化。加繆批判「以目標的合理性來論證手段的正義」的歷史觀，即便再高尚的目標也無法證明專制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正當性。

加繆指出，當人意識到歷史的荒誕時，就開始了歷史的反抗，也就是拒絕謊言、暴力、殺戮和戰爭，拒絕歷史的絕對化。加繆認為，我們不能在受害者與劊子手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必須擺脫「以暴易暴」的邏輯，「既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⑩。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不遺餘力地對極權主義展開批判，不認為在「反動的專制」和「進步的專制」之間，在「歷史上的集中營」和「會帶給人們希望的強迫勞動制度」之間存在根本的區別^⑪。在加繆看來，世界本身不存在最終的意義，但「人卻有意義，因為他是堅持擁有意義的唯一生物。在這個世界上，至少有人真理」^⑫。加繆要求歷史服從于一種更高的價值，即人的價值。加繆反對以所謂遙遠崇高的目標犧牲當下的個體，主張尊重個人生存的權利，維護生命的價值與尊嚴，個體的生命

不應為某種政治目的被抽象和淡化為冰冷的數字或代號。面對二十世紀以歷史的名義將暴力和罪行合法化所造成的災難和浩劫,加繆認為,對於在歷史中曾經犯過的錯誤,所付出的犧牲,我們要懂得反省並修正,要清楚界限的存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再生」。

二、對形而上學與宗教救贖的質疑

帕斯卡(Blaise Pascal)是第一個指出理性本身的內在矛盾及其界限的哲學家,加繆對帕斯卡甚為敬仰和推崇。帕斯卡在其論著《思想錄》一書中考察了人的本性,宣稱我們最深層的直覺並非來自理性,「心靈有其不為理性所知的自身理性」¹³。加繆也欣賞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反理性主義和直覺主義,認為只有直覺才能把握實在,強調對本質的直接認知或領悟。

對加繆而言,在這個無法用理性理解與把握的荒謬世界裡,只有能夠被感官感知的東西才是可靠的,因而反對一切超驗的東西:「我能感覺到我的心,於是斷定它存在。我能觸碰到這個世界,並由此斷定它存在。我的所有知識到此為止;其餘均為建構。」¹⁴在加繆看來,人自身有意識的存在與可觸及的世界的存在,比其他東西都要直觀:前者是已知的事實,後者則包含了假設與解釋的成分。加繆認為,人不能陷入對概念的頌揚或簡單定義之中,因為概念一旦超出個人經驗範圍,就逃脫了人的把握並失去意義。與薩特和同時代的許多哲學家不同的是,加繆對抽象的問題並不特別關注,他堅持只從自己感性認知到的一切當中得出結論,不貿然提出任何假設,不相信形而上的真理,也不寄望於未來的烏托邦。他曾明確表示:「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對理性沒有足夠的信任,更無法相信一種理論體系。我所感興趣的是探討怎樣行動,更確切地說就是當人們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時候應該如何生活。」¹⁵加繆拒絕抽象晦澀的理論,他的哲學不是純思辨的哲學,而是生活的哲學,關注的是生活的意義和人類的命運等社會現實問題以及與人的生活緊密相關的倫理道德問題,探求如何具體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世界是荒謬的,在認識到這一點後,人應該如何自處?世界無法賦予生命以意義,有人以「形體的自殺」求得解脫,有人通過「思想的自殺」,即從宗教處尋求安慰。加繆批評俄國哲學家舍斯托夫視上帝為「荒謬的唯一出路」。¹⁶與舍斯托夫、克爾凱郭爾、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等一些存在主義哲學家不同,加繆不相信「所有形式的跳躍,向神聖或向永恆的跳躍」¹⁷,也不贊同「沉溺於日常或觀念的幻想」¹⁸。在加繆看來,這種「哲學上的自殺」無異於怯懦逃避和自我欺騙,「強制的希望就是一切宗教的本質」¹⁹,加繆認為人不需要從上帝或神明處獲得寄託和皈依,寧可毫無希望地生活在有神論者所謂的「罪惡與絕望」中。

加繆的哲學思想與其對宗教的態度緊密關聯。在他未完成的遺著、自傳體小說《第一人》中,加繆提及自己的原生家庭對待宗教的態度:作為名義上的天主教徒卻很少需要神父,既不做彌撒,也不談上帝。在外祖母的堅持下,加繆十歲就初領聖體並在教區的教堂接受了兩年的基督教教理課的講授。但對年輕的加繆來說,「宗教是可笑的迷信活動……宗教僵化成習慣,沒有真正的信仰,沒有愛,只是老年人的癖好,一種毫無價值的玩物」²⁰。加繆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一次訪談中表示:「我關注基督教,但在天性上我沒有宗教信仰。」加繆不信仰上帝,將自己視為在天性上無宗教信仰的人:一個熱愛實實在在的世間享樂、而不是虛無縹緲的上蒼賜福的人。加繆的異教徒特性也表現在他對「希臘式」思想的開放性與溫和性的認同遠甚於基督教的上帝權力絕對論。²¹

加繆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從未放棄過對自己拒絕追隨的基督教的思考。加繆于1936在阿爾及爾大學提交了一篇題為《基督教形而上學與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論文,內容是比較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普洛丁與基督教教義學的代表奧古斯丁著作中的希臘思想和基督教精神。坎伯(Richard Kamber)指出其時的加繆是一位無神論者和狂熱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他選擇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的形而上學作為論文題目是相當奇怪的。²²加繆一直關注基督教,在其後來的多部作品中均出現了與基督教或神職人員相關的內容和討論,比如《局外人》、《鼠疫》和《墮落》,加繆稱《鼠疫》是其「最反基督教的書」²³。對於加繆為何長期迷戀一個他所棄絕的宗教,坎伯認為從薩特對加繆的進言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在你的書中存在一種對上帝的仇恨,在這一點上,他們可以稱你為「反有神論者」,而不是「無神論者」。」²⁴對於一個無神論者,上帝與他無干;而對於一個「反有神論者」,上帝則是與他相關的。作為「反有神論者」的加繆看來,有三種關於上帝的可能:要麼上帝是不存在的,要麼上帝保持沉默,或是上帝偏袒部分人而忽視其餘的人。加繆認為沒有強制的理由促使人去信仰上帝,更無緣由去相信來世,人只在此生之中。加繆將自己的職責定位於為那些既無信仰、也不確信上帝存在且沒有希望得到上帝恩典的人尋找出路,認為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要展示「即使是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裡……獨自處於宇宙中的人仍然能夠創造他自己的價值」²⁵,這是時代擺在人類面前的重要問題。

加繆始終反對超驗性,對宗教持批判態度,反對在神學中尋找思想的避難所。加繆堅持認為「這個世界並無超凡的意義」²⁶,他對一切意識形態所許諾的終極目標抱持極端懷疑的態度,不管是宗教還是世俗意義上的。加繆反對形而上學的觀點,反對希望原則,對永恆和終結表示懷疑,不相信彌賽亞式的救贖力量。相較於遙遠的天國,他更在意人在當下的幸福,與永恆的聖寵的世界相比,他更看重這個世界有限的自由。他試圖用正義的王國取代聖寵的王國,在神的團體的廢墟之上建立人的團體。加繆反對為了虛無縹緲的理想犧牲個體現世的利益,認為要把人從各種企盼救世主降臨的思想中解放出來,擺脫對各種人間天堂的嚮往。作為無神論者或者「反有神論者」的加繆通過拒絕希望和肯定生命來確認人的獨立和生活本身的價值。他立足現實,重視當下,關注當前社會中的現實問題,宣導一種積極入世的人生觀,主張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來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他超越虛無主義,所堅持的正是反宗教與反意識形態的人道主義立場。

尼采說:「上帝死了,我們自由了。」而對加繆而言:「上帝死了,我們的責任更重了。」²⁷否定上帝,就意味著人要對自身擔負起責任,成為價值的創造者。從發現外在的荒誕到反省內在之責任,加繆實現了一種思想的超越。

三、以反抗的姿態對抗命運

作為一個關注人類生存處境的思想家,加繆認為「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²⁸。他沒有將這個沉重而嚴峻的問題歸結為社會學或精神醫學的研究物件,而是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加以分析和考量,認為真正要回答的是「生命的價值、選擇與依靠問題」²⁹。在加繆看來,最重要的不是追問人生是否值得活,而是必須知道如何去活。加繆表示他的興趣在於弄清楚人是否能夠「沒有訴求而生活」:「沒有訴求」意味著排斥希望,即「思想的自殺」;「生活」則意味著否定死亡,即「形體的自殺」。³⁰如果意義不能通過超驗的存在來獲得,那麼只能「反求諸己」由人自身去創造意義。正如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所言:「他[加

繆]不斷確認人類處境的荒誕,然而其背後卻非荒蕪的否定主義³⁹。加繆所關注和思考的核心問題是:面對一個荒謬且暴力橫行的世界,人應該如何生活和行動,如何面對荒謬、反抗荒謬與超越荒謬。通過使用「荒謬」的概念,加繆否定了傳統本質論哲學對人的先驗性價值的定義,給個人的自由選擇開闢了新的空間。

加繆認為,人生越沒有意義就越值得一過,要以完全接納的態度對待命運,要正視荒謬並與之共存。逃避對加繆而言意味著「哲學上的自殺」,而對抗荒謬的方式就是「反抗」。加繆認為,「反抗誕生於無理性的場景與不公正的難以理解的生活狀況」⁴⁰,人希望在混亂中建立秩序,在事物中建立統一性。反抗是一種拒絕,是放棄的反面,「是人與自身的陰暗持續的對抗」⁴¹,貫穿於整個存在的始終,哪怕深知荒謬是無法改變的人生底色與生存狀態,仍然堅持與之不懈抗衡。對加繆而言,「完全有尊嚴的生活是在充分認識到荒誕之後的為生活而生活」⁴²,因而承受荒誕,拒絕自殺和反抗絕望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必然選擇。

正因為來日是不存在的,沒有所謂的「彼岸」,所以在加繆看來,人應當活在當下,重視「此在」,關注個體此世的感受。他拒絕永恆,肯定現世的美好與生命的歡樂。加繆認為,「人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且是他唯一的目的。如果他想成為什麼,也只能在此生當中」⁴³。他肯定現世生活的意義與價值,拒絕將歡樂推遲到後來,認為「對待未來所表現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於把一切獻給現在」⁴⁴,對人類而言重要的是對生活本身有意識的體驗。因此人應當在此生中「窮盡現存的一切激情」⁴⁵,「活出最大限度的量」⁴⁶。在沒有神的荒謬世界裡需要的是思想清晰且不抱希望的人。加繆引用品達的兩行詩作為《西緒福斯神話》一書的題詞:不求永生,竭盡人事。懷抱激情卻又摒棄希望原則地生活,這是加繆在荒謬世界中對抗荒謬的態度。

面對荒謬,加繆在希臘神話人物西緒福斯的形象中找到了,或者確切地說,創造了自己的反抗英雄。神話中的西緒福斯因為過錯被判處推石上山的苦刑,每當石頭到達山頂後重又滾落下來,周而復始,永不停息。西緒福斯每日需要面對的就是這樣既無用又無望的勞動,一種傾盡全力卻一事無成的永無休止的折磨。西緒福斯無能為力卻又不放棄反抗,是「荒誕的英雄」⁴⁷,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工作的無意義性和個人處境的悲劇性,他亦清楚自己的未來將永如今日沒有改變的可能,他所能做的只有改變自己的態度與命運抗爭。「對神的輕蔑,對死亡的仇恨,對生命的激情」⁴⁸是西緒福斯對抗荒謬的武器,對他而言「沒有輕蔑克服不了的命運」⁴⁹。在加繆的設想與詮釋中,西緒福斯窮盡一切並耗盡自己,以一種巨大的激情堅定地反抗他的環境,堅持一種被視為沒有結果的努力,他擔負起了自己的命運,成為自己歲月的主人。當人能夠不依靠乞求神所賜予的希望和幫助自行生活時,他就成了自己的主宰,幸福就存在於這一主宰之中。在加繆看來,「對抗山峰的鬥爭足以充實人的心靈」⁵⁰,通過直面人生與現實,摒棄虛無主義,懷抱反抗荒謬人世的激情,人應該而且能夠獲得生存的勇氣,乃至幸福。反抗給予生命以價值和尊嚴,賦予存在以高尚的意義,這是一種勇敢且崇高的倫理姿態。

加繆的反抗哲學是對荒謬哲學的發展與延伸,是對其所身處的時代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如戰爭、革命、暴力和專制主義等,是一個知識份子對時代的理解和評判,構成了他新人道主義的核心。在《反抗中的人》一書中,加繆以個體的自殺與荒誕的概念作為出發點,進而對集體的殺人與反抗進行思考,並就反抗的成因、反抗的類型、反抗的界限等問題作了具體的闡述。加繆從「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的反抗」兩個方面回顧了反抗的歷史,進而通過對「反抗與革命」兩者區別的剖析點明了全書的核心思想:現代革命是虛無和瘋狂的,均始於反抗卻以專制主義告終。革命是必要的,但要防範革命陷入虛無主義與對暴力的濫用,應使革命回到它反抗的本源。真正的反抗是創造價值,是以建設和創造來替代破壞和毀



滅,以非暴力的反抗作為通往合理的制度與美好的世界的手段和橋樑。

作為反抗荒謬的鬥士,加繆本人也在現實中踐行了反抗的主張,他積極加入反法西斯的戰鬥,與不幸的個人命運抗爭,與政敵論爭,「與非正義,與奴役和恐懼作鬥爭」^③。在為《戰鬥報》所撰寫的一系列檄文中,加繆提出要將正義和自由協調一致起來,應為在兩者之間尋求更高級的平衡而作出努力。他號召民眾起而反抗,不能放棄表面上看起來沒有意義的努力,要同令人失望的命運抗爭,因為這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努力和奮鬥的事情。他認為二十世紀最艱巨和神奇的任務在於,要在這個已變得最不正義的世界建立正義,拯救那些從一開始就註定受奴役的靈魂並給他們以自由,哪怕可能遭遇失敗也要努力去嘗試。^④加繆承認人類共有的普遍人性,力圖通過反抗理論建立一種新的人道主義,一種建立在理解與仁愛、適度與平衡、人的價值與尊嚴基礎之上的人道主義。

1943年夏天,加繆開始為抵抗運動的其他報刊連續撰寫了四封給一個臆想中的德國朋友的書信,這些書信在戰後被編成一本題為《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的小冊子出版。在該書義大利文版的前言中,加繆稱之為「反對暴力的鬥爭的文獻」,他強調:「當這些信的作者說「你們」時,他不是想說「你們德國人」,而是想說「你們納粹黨徒」。當他說「我們」時,並非總是指「我們法國人」,而是「我們自由的歐洲人」。我使之對立的是兩種態度,而不是兩個民族。」^⑤與加繆從前的作品相比,《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加繆對團結和互助友愛的強調。在前期的作品中,加繆著重描述個人一個上帝缺席、希望和意義缺失的世界中所遭遇的困境,但在《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中,他把獻身於一種共同的事業視為意義與價值的源泉,強調一個共同的歐洲的思想和希望。人類有對公正和幸福的自然需求,因此應團結起來對抗非正義並創造幸福。加繆將個人性的反抗上升為一種人類普遍的反抗意識和反抗行動,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以及「人類的團結」^⑥促使反抗從個人的反抗走向集體的反抗。

結語

桑塔格(Susan Sontag)評價加繆作品的非同尋常的吸引力源自一種「道德之美」,認為「此乃二十世紀大多數作家無意以求的一種品性」。^⑦加繆所生活的二十世紀的一大特徵是政治被擺到了突出的位置,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大戰把廣泛受到波及的人捲入到政治的洪流中,鮮明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是時代對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和作家的要求,文學與哲學也在政治化的大潮中被打上了時代烙印。加繆以寫作為己任,以反抗作為作家的政治責任與歷史使命,認為作家的職責是發出警告,與所有奴役的形式作鬥爭。他在揭示世界的荒誕性的同時卻不悲觀絕望,主張在荒謬中奮起反抗,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在宗教與暴力革命之外的人道主義之路。

注釋

① 傅佩榮著:《荒謬之外——加繆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頁21。

② 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加繆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52-56。

③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5.

④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24.

- ⑤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29.
- ⑥ 丁大同著:《加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79。
- ⑦ 阿爾貝·加繆(著),丁大同(編譯):《加繆自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253。
- ⑧ 卡爾·波普爾(著),何林、趙平(譯):《歷史主義貧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頁46。
- ⑨ 卡爾·波普爾(著),王凌霄(譯):《二十世紀的教訓: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55。
- ⑩ 阿爾貝·加繆(著),邵世恒(譯):《既不當受害者,也不做劊子手》,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版,頁18。
- ⑪ 阿爾貝·加繆(著),楊榮甲、王殿忠(譯):《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頁135。
- ⑫ 理查·坎伯(著),馬振濤、楊淑學(譯):《加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106。
- ⑬ 理查·坎伯(著),馬振濤、楊淑學(譯):《加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16。
- ⑭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31.
- ⑮ 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加繆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46。
- ⑯ 丁大同著:《加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80。
- ⑰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08.
- ⑱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08.
- ⑲ 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加繆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75。
- ⑳ 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加繆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207。
- ㉑ 理查·坎伯(著),馬振濤、楊淑學(譯):《加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13-14。
- ㉒ 理查·坎伯(著),馬振濤、楊淑學(譯):《加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23-24。
- ㉓ 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加繆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140。
- ㉔ 理查·坎伯(著),馬振濤、楊淑學(譯):《加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45。
- ㉕ 羅伯特·澤拉塔斯基(著),王興亮(譯),賈曉光(校):《阿爾貝·加繆:一個生命的要素》,桂林:灕江出版社2016年版,頁6-7。
- ㉖ 阿爾貝·加繆(著),楊榮甲、王殿忠(譯):《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頁22。
- ㉗ 傅佩榮著:《荒謬之外——加繆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頁198。
- ㉘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5.
- ㉙ 王洪琛著:《加繆的思想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23。
- ㉚ 傅佩榮著:《荒謬之外——加繆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頁62。
- ㉛ 阿爾貝·加繆(著),丁大同(編譯):《加繆自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31-32。
- ㉜ Camus, A. (2013). *Der Mensch in der Revolt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22.
- ㉝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67.
- ㉞ 理查·坎伯(著),馬振濤、楊淑學(譯):《加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90。
- ㉟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04.
- ㊱ Camus, A. (2013). *Der Mensch in der Revolt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396.
- ㊲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73.
- ㊳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74-76.
- ㊴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42.



- ④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42.
- ④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43.
- ④ Camus, A. (2014). *Der Mythos des Sisypho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145.
- ④ 丁大同著:《加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78。
- ④ 阿爾貝·加繆(著),楊榮甲,王殿忠(譯):《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頁42-43。
- ④ 張容著:《形而上的反抗——加繆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頁186-187。
- ④ Camus, A. (2013). *Der Mensch in der Revolte*.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p. 31.
- ④ 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反對闡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頁63。
- ④ LIU Shixian. (2023). Transnational Trauma and Politics in Phil Klay's Post-9/11 War Novel *Redeploy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 29-38.
- ④ ZHANG Chuanqing & LI Yingxin. (2023). The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Great Harmony Society" and Communist Ideal.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 121-131.

(Editors: Joe ZHANG & JIANG Qing)